

# 坦克猫 No.07

## 导言

我该谈点什么呢？

谈谈今天的雪？谈谈 2 月 20 号那糟糕的天气？亦或是谈谈我很喜欢的格非和我一直记得的《褐色水边》中的棋？

可是你看，我其实什么也谈不出。

所以你还是看看他们的文字吧。

## 目录

导言.....	2
目录.....	3
格非：平人的潇湘（访谈）.....	4
徐友渔：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哲学）.....	8
推倒柏林墙：放开那个乞丐（社会）.....	14
芦笛：一个大汉奸的忠诚观（社会）.....	17
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其原因和后果（政治）.....	20

## 格非：平人的潇湘（人物）

原文链接：[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2153\\_27175.html](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2153_27175.html)

原文日期：2007年02月01日

### 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 25 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

### 普通人心中的高妙

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从仲月楼这些人的身上，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杳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并不是贞烈节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那个男的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道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 徐友渔：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哲学）

原文链接：[http://www.scuphilosophy.org/ScholarsLibrary\\_display.asp?userid=461&art\\_id=126](http://www.scuphilosophy.org/ScholarsLibrary_display.asp?userid=461&art_id=126)

原文日期：2010年04月03日

捷克人真是了不起，在经历似乎绵延无期的民族苦难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了两位伟大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两位世界级大师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广为译介，而哈维尔则是只知其人，未见其文。昆德拉被文化人津津乐道，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在一些人中间，已经形成一种“昆德拉情结”或“昆德拉精神”，作为生活与



写作的资源，而哈维尔的精神和形象则使某些人烦恼、不安，其结果是故意的冷淡与缄默。事实上，不少人对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心知肚明，两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论无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我对两位作家都很喜爱和尊重，认为两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轩轻，决无推崇一个，贬低一个之意。但我想矫正对昆德拉的某种误读，还想把中国人在明显偏好之下藏着捂着的一些东西抖落开来。我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会受到批驳，这不要紧，有话明说总是一件好事。

## 轻与重

在昆德拉笔下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最有才华，最能洞穿世事。如果说，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是一个见仁见智、谜语般的概念，那么萨宾娜的行为和感情就是破谜的解码符。萨宾娜是背叛的象征和符号。一连串的背叛使人直面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刃……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又怎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如果说“背叛”这个词因其道义色彩而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习惯，那么“消解”或“解构”立即可以成为代替词。背叛即是对固有价值消解，对既定意义的解构。人生而处于一套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对亲人的依傍，对故土的眷念，对友谊的诚挚，对爱情的忠贞，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这一切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托，但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经受选择和决定的考验，它们这时就成了负担，令人感到不堪其重。轻，则是层层消解之后无重力吸引或牵制的感觉，它既可能产生自由不拘的快感，又可能产生无所依凭的空虚和恐惧。

消解的前提条件是思想的力度，直面虚空则需要勇气。

与萨宾娜恰成鲜明对照的角色是弗兰茨，被萨宾娜背叛得最无情的是弗兰茨。也许，在某些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的人看来，弗兰茨象征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人道主义，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反思。他就读于巴黎，天资不凡，20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以后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他不满足于学院式的成功，认为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与人们并肩游行，同声呼喊，他要为真理和正义战斗。弗兰茨对萨宾娜的爱慕掺杂着这种理想主义情结，每当她谈起自己的祖国，他听到“监狱”、“迫害”、“坦克”、“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而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他认为，这位来自苦难之乡的女性，进入他那宁静平庸的生活，就像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显然，弗兰茨的爱慕，除了情与性，还带着观念色彩。当然，很难说这种观念的成份，应该受到尊重还是轻视。

尽管弗兰茨对萨宾娜极尽倾慕呵护之能事，但在心性更高、阅历更深的她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多少分量。萨宾娜认为“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

没有丝毫浪漫气息，惟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但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从一般的标准看，弗兰茨近乎完美无缺：学术上的成功、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此外，他英俊高大，风度翩翩，更难得的是，他健壮有力，曾当过拳击冠军。“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当弗兰茨温柔地向她表白“爱意味着解除强力”时，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当弗兰茨既出于爱情，又出于正义冲动好不容易背叛家庭时，萨宾娜却背叛了他，不留一句话，悄然而去。萨宾娜的背叛是轻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胜利是巨大的苦难代价之后的报偿：它将无家可归、亡命天涯的人对好心肠的施恩者在精神上的优越感暴露无遗。对少数优秀者而言，苦难可以转化成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四海漂泊，这财富却永不离身；他们受人救助，但从不仰人鼻息，永远心高气傲。应该注意，萨宾娜的轻并非生就即轻，而是经历了许多重之后的轻；没有重也没有轻，否则是漂浮之轻，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离弃一位西方优秀的文化人，也不过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已。

在继续根据昆德拉的文本谈论轻与重之前，我止不住想就刚才所谈发表几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昆德拉对于西方的文化精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刻薄和怨毒心态，虽然我知道出自东欧国家的文化流亡者或移居者往往如此，但我原本期望昆德拉会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

根据昆德拉的安排，弗兰茨参与了西方文化精英进军柬埔寨的作秀式闹剧，在垂头丧气、无功而返的途中，被曼谷的一帮抢劫者杀害。更具讽刺性和更为刻薄的是，死了的弗兰茨最终还是属于他曾经背叛过的妻子。读到这里，我不但颓丧，而且绝望，如果弗兰茨的命运果真由别人安排，我不禁要为安排者如此刻薄而感到寒心。

如果允许扯远一点，我在此想指出，弱势民族中，抱怨和不满西方文化精英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受惠于西方社会中无权无势的热心人，一方面又爱摆出既要吃又要骂的姿态。这倒不是因为“给了人情反招恨”的心理情结，而是因为施恩者被视为肤浅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而让人感到受不了。同情也罢，欣赏也罢，人家熟悉的毕竟还是自己的东西，再有理解的愿望，也难于到位，再使劲帮忙，充其量也只能把你安置在边缘，摆弄成配角。于是，那些穿透力极强的眼睛，终于发现恩主们到底还是白人文化中心论者，是新的救世主、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不明白，那些热衷于在西方卖国货，又回过头来对国人大谈自尊的人，为什么要假定西方的文化人非得完美无缺不可，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去讨没趣，讨气受？

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解读出一个“轻”，这轻使他们摆脱了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的重担；这轻使他们逃离价值的约束，标准的衡量；这轻使他们无拘无束，为所欲为；这轻使他们像膨胀了氢气的气球，脱离地球重力的吸引，飘飘然上升，乘风而去。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他们没有解读出昆德拉作品中的重，他们没有看到，昆德拉所描述的、萨宾娜所经历的轻，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这轻和重联系在一起，没有重，则不能言轻。

萨宾娜，这个象征轻的符号，在暮年以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用重来刻画自己挚爱的情人托马斯的一生。

托马斯夫妇是幸运的，苏联军队入侵之后，托马斯以自己的名声，被西方医学界同行安排出国，在瑞士获得一个不错的职位。但特丽莎忍受不了国外生活的轻松悠闲，她返回布拉格。托马斯在轻与重之间有好一阵挣扎：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永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他得马上回去。院长是帮助托马斯逃离灾难的人，他不理解，他生气了。他质问道：“非如此不可吗？”托马斯答：“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面临的另一次抉择是在声誉和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之间作出权衡。托马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主张曾经制造过冤案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情或信仰纯洁而开脱责任，苏军占领期间，有关当局命令他收回此文，不然就不能继续从事医务和科研工作。尽管所谓收回只是私下写个纸条，尽管周围的同事都料定他会妥协，尽管他在自己的职业中寄托了生命的意义，但他拒绝收回。他沦为窗户清洗工，最后移居穷乡僻壤，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其实，他可以轻轻松松地另作选择，保留生活中他应得的一切，但他以自己后半生的生命为代价，选择了重。

## 退与进

自进入 90 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对于 80 年代文化热中自身的形象和作用作出反思与批判，以前公认的价值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定。在这思想文化氛围大转换的过程中，昆德拉的作品，与其他思想资源(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哈耶克和柏林的保守自由主义观点，等等)一道成为武器或说辞。不少人认为，80 年代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从事思想启蒙，这种做法在 90 年代再也行不通了。还有人认为，80 年代的启蒙话语表面上是以新(科学、民主)反旧(封建专制余毒)，实质上是以旧反旧，因为那种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调的话语，虽然在内容上与旧话语相反，但结构上是相同的，即具有集体性、强制性、垄断性，真正的新话语应该纯粹是个体性的，应当不落政治和历史的窠臼，彻底的新应当是对道义、责任、使命、真理等等的拒绝。

昆德拉的作品似乎提供了文本依据。

昆德拉议论说，争取自由、正义，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虽然像是令人陶醉的伟大进军；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媚俗，它对局势的改变于事无补，那些参与者不过是要表现自己的无所畏惧，因此，在他的笔下，欧美文化名流进军柬埔寨充满了出风头 and 倾轧，纯属一场闹剧。在托马斯拒绝签名的场景中，昆德拉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托马斯走进征集抗议信签名者的房间中时，迎面看见墙上一幅大宣传画：

那张画模仿了 1918 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

昆德拉想说的是，就以争取自由为名而行强制之实而言，捷克的反抗者和苏联占领军有多大区别？

当征集者希望托马斯尽快考虑决定是否签名时，他感到这人和要求他签署收回观点声明的警察没有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这里忽略了一点，拒绝警察将大祸临头，而拒绝群众抗议者不会引起实际的侵害，充其量招致误解和轻蔑。人们现在习惯于将体制与非体制的强制等量齐观，都是抹杀了后果的区别。）

与进军柬埔寨的西方名流一样，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装腔作势、煞有介事。他想对托马斯表示好感，说“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对这种精英心态，托马斯报之以沉默。这人还告诉托马斯，房间可能被秘密警察安了窃听器，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他大声对着墙中想象的麦克风讲话，而心中打着另一种小算盘：自己的言行已记录在案，进入了历史。

托马斯认为，靠一纸请愿书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当他的儿子说“签字是你的责任”时，他激怒了，他把这当成要挟，决然地拒绝签名。如果昆德拉想说，托马斯有权拒绝签名，这没有错，尤其是在他描述的那种情况下，拒绝很可以理解。但昆德拉的主张远非仅此于此。

昆德拉还借萨宾娜的观点表明，尽管苏联的入侵使得群情激愤，人们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高举拳头，呼喊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法西斯和所有的入侵与占领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我们确实看到过恶与集体一致相联系。但难道可以说凡集体一致皆为恶？纳粹冲锋队的游行与罗素领导的反核和平运动是一回事？放弃集体行动，以什么方式抗恶？独善其身岂非任人宰割？）

如果说、集体话语方式有可能与法西斯相关，那么昆德拉及其追随者把二者当成了必然相关，把集体性抗恶视为恶。更有甚者，有人把现实的恶悬置起来，高声谴责抗恶的要求和冲动。

在如此令人气闷的气候中，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转向哈维尔，其实，我们早就该关注他了。

哈维尔以平和的口气这么评论昆德拉：

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

如果说，昆德拉在小说中把抗议运动写得乌烟瘴气，把抗议人士写得丑态百出，那么哈维尔却以自身的言行提供了相反的形象。在他的自传中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人忽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哈维尔和战友们利用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为自己的运动起草一份遗嘱式的历史性文件：

我被任命为负责迅速起草这个文件的三个委员之一，于是我们马上就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开始草拟。但不巧的是我还得去出席离此不远，位于斯帕列纳大街的斯帕列纳美术馆我朋友的画展开幕式。我不是去发表什么高论——这将由艺术史家们去做——而是参加一个歌唱节目的表演。我的这位朋友是个达达主义者，他就喜欢唱走调的爱国歌曲，喜欢我热情地吟诵我们民族的古典文学的精华。所以，我装着去方便一下而溜去参加了那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我的歌唱和吟诵欠有震惊四座之势。然后我又匆匆赶回电影俱乐部，参加了那份文件的最后一段的起草工作。

从哈维尔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在真实的运动中，以平常心投入，只顾效果而不计名位，处事有举重若轻气概者，大有其人。

作为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哈维尔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与政治家通常的争取、鼓动、说服、指导、号召，甚至命令威胁不同，《宪章》不强迫别人于什么，不鼓动、号召大家，不试图对任何人说教，不代表任何人，也从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们。“《宪章》并不认为它的活动方式是惟一的、最好的，也并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它”。

哈维尔特别不能同意昆德拉书中的这种说法：请愿毫无用处，只是一一些人想出风头。他说，受难者认为：

当得知人们普遍表现淡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然而，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

许多人回避社会责任和道义表态的理由是，他们厌恶政治，似乎任何政治性或社会性行动都必然扭曲人性，但哈维尔谈到不同信仰、职业、年龄的人参加他发起的运动时说：“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在一起来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

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在哈维尔看来，做一个公民，就应当意识到表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这里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别人也是公民，当别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时，你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只是对某个人的侵犯，而且是对公民权本身的侵犯。

我承认，就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而言，哈维尔的主张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决不会去嘲讽和诽谤。哈维尔的出现或许使人难堪，但我宁愿有这样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

## 推倒柏林墙：放开那个乞丐（社会）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75292.aspx>

原文日期：2011年02月16日

前段时间看了彭高峰那篇《真实记录我的苦涩无助的寻子日记》，内容堪称是触目惊心啊。依此文来看，彭高峰的痛苦是由两类人造成的：令他“苦涩”的当然是万恶的人贩子，而让他“无助”的则是我国的公务员，他们在彭高峰寻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已经不是零作用，而是彻底的一个负作用。事实上我粗扫一眼这篇几万字的长文，里面至少有80%以上的篇幅，都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政府。

这倒还不算什么，因为我这个人的思想觉悟非常高，有困难的时候从来不指望政府，以免给国家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岂料彭高峰同志的觉悟竟然比我还高：“当然也有很多的境外媒体，为了国家的名誉，我都婉言谢绝了采访，因为境外的媒体并不是为了帮我们呼吁找孩子，而是借助我们的事情来攻击中国政府的人权……我不是抬高我自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党员这样的觉悟还是有的。”多好的人民啊，人没了，权也没了，他居然还想着要维护“国家的名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政府的名誉。我要是政府官员，早就感动得涕泪横流，羞愧得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了。这篇文章我是分两次看完的，盖因此文“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抑制不了想吐的冲动，毅然点了浏览器右上角的叉叉。

当我对这种诡谲的现象大发感慨的时候，淫淫网上的一位自费五毛阴阳怪气的赠给我一副“生活小贴士”：孩子丢了要找警察，找西方媒体是没有用的！他说的好像彭高峰是智障，压根就没有报过警一样。事实上警方最初根本就懒得鸟他，派出所甚至拒绝提供当天的监控录像，而这一局面在彭一次进京上访的尝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政治警觉性极高的火车乘警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上访材料，于是一行人刚刚踏上皇城土地，就被十几个神兵天降的深圳警察截住，用飞机给送回老家去了，让我深刻体验到了截访服务的人性化（可以想见这帮人是常驻于京，专门处理此类“突发状况”，难怪北京的人口这么多，原来全国各地的警界精英都集中在这儿了）。这下警方总算开始“重视”起他们的案子，起码姿态到位，同意调出当天的录像了。事发十天之后，彭高峰终于亲眼目睹到自己的儿子被人抱走的场景，而这时人贩子早已远走高飞，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此后彭高峰又被N个部门当皮球踢了一圈，市长接访日也见不到市长大人，于是决心在六一儿童节搞点事出来，吸引一下政府的注意力。彭高峰这下是想错了，其实老大哥一直在默默的注视着他，警方立刻把他忽悠到外地，住四星级宾馆，花三万多元纳税人的钱让他“被旅游”，目的竟然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和谐快乐的儿童节。我只知奥运会期间有所谓“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畅通大道”，这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们的政府对儿童节都如此煞费苦

心，小时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就是他求助于警方的下场：他们宁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粉饰太平，都不肯老老实实的去找一下孩子。对我们这个政府来说，人贩子不是麻烦，不停上访的家长才是真正的麻烦；能不能解决问题并不重要，能不能掩盖问题才是关键所在——毕竟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本身正是问题的制造者。这彭高峰早先居然还陪着政府一起掩盖问题，直到他被城管骚扰，被警方辱骂殴打非法监视监禁，被信访部门无限期的延宕，被中央电视台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名拒绝报导其遭遇之后，彭高峰的“党性”终于不复存在，毅然走向了协助西方媒体“攻击中国政府人权”的道路。

这段时间微博上兴起了一阵“打拐运动”，有人兴奋并表示，这是一起群众自发组织的“公民运动”。这话我是怎么听怎么觉得别扭，咱以前还真没听说过哪个公民国家就连打击拐卖这种事都是靠土法炼钢式的全民上阵来搞定的，这回屁民国家反倒是国际先进水平了一把。想想也是，那天兰总还在感慨，在中国买卖一个小孩的价格居然不过三五千元，足见拐卖人口几乎没什么风险。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公安干警，中国的拐卖事业怎么可能不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人民群众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难道还等着失踪的小孩凭空从天上掉下来？

于是乎没过多久，几千个童乞的照片便被公开贴到了网上。这里面可能有 99%以上的人根本就不是被拐儿童，而且也从来没有允许过任何人发布他们的照片，更不可能愿意一天被带回局子里盘问四次甚至抽血验亲，但是我们的打拐英雄们表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牺牲一部分人的小小权益，便可以让彭高峰这样饱受失子之痛折磨的人合家团圆，岂非美哉？这话听着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像上帝一样坐在电脑前轻描淡写的大谈实用主义，其实是因为照片被贴在网上、走到半路被抓去验血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乞丐这种“低等人”根本就不配享有正常人的权利，是因为乞丐们即使受了委屈也无力反抗，甚至没有能力上网骂他们一声傻逼，而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就是非要别人撕破脸了他们才知道自己在犯贱，所以打拐犯们才能如此心安理得的践踏这些弱势群体的人格。如果没有少数像网易这样的媒体愿意去挖掘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岂会知道一位老妇在被那些打拐犯们用 N 百万像素兼自动对焦的漂亮手机围拍时失声痛哭，愤而砸掉了面前的饭碗？

事实上根据报导，最近几乎所有被抓去验血的乞丐最终都被证明身边带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南方都市报更指出，迄今为止找到那些的被拐儿童没有一例是因为随手拍行动而获救的，彭高峰是自己把照片发在网上，别人看到他儿子后提供线索，跟随手拍根本扯不上边，所谓“解救 6 个儿童”完全是窃取别人的胜利果实。被拐儿童的真正流向是非法收养，把矛头指向乞丐完全是搞错了斗争的方向，根据打拐犯们实用主义的思想，以后你走在街上，只要看到一小孩长得跟他爹娘不像，你就应该走上前去咔嚓一张并传到网上，而且要当着面拍，大义凛然的拍，前后左右 360 度环拍，正义的事业何必搞得那么偷鸡摸狗？最好警方能给全国人民都做个强制亲子鉴定，不仅可以解放大量的被拐儿童，还能顺带拯救若干蒙在鼓里的绿帽父亲和相互猜忌的不幸家庭，简直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实用得不能再实用。

又有人说了，让儿童上街行乞本来就不对，欧美国家都是如何如何……确实，我在德国不要说是童乞了，就连个像样的乞丐都没有见过。第一位向我要钱的德国人腰围至少是我的 2.5 倍，第二位牵着条毛色金黄油光水亮的大狗，第三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往他面前一站我顿时感到自己才像一个乞丐，我要是给他钱那我不是装逼吗？其余行为艺术者不一一列举。但国外没有童乞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有立法禁止儿童乞讨，而在于拥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武状元苏乞儿》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丐帮弟子 2000 万，什么时候解散不是我丐帮帮主决定的，而是由你皇帝决定的，试想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令到国泰民安，人人有工开，

有饭吃，鬼才愿意出来做乞丐呢！”如果真的是要解决童乞问题，单纯的禁止完全是头痛医脚、本末倒置，假如中国能为这些儿童提供良好的救助，即使没有硬性的法律规定，又有多少家长会愿意带着自己的小孩流浪街头、风餐露宿？而我国一直有一特色，“国际接轨”往往只接一半，还有一半总也接不上，有那么一个群体总要掉链子。在这种情况下立法禁止儿童乞讨，结果不过是逼迫那些乞丐家庭远离城市，为和谐社会的光鲜表象下再添一堆不为人知的坟墓而已。而这一悲剧如今已然在大连、石家庄等各大城市上演，此刻那些所谓正义人士的面目，可憎得就像他们自己平素最讨厌的城管。

如果人们真想改善童乞问题，真正该做的事情是督促政府建立完备的保障体系。问题是你说“督促政府”这四个字，前一秒还在街上拿着照相机闲晃、道德优越感爆棚的人可能下一秒就消失无踪了，无怪乎“随手拍政府大楼”、“随手拍公车”等活动无人问津。想想也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其实没有人有能力去督促一个枪杆子政权。你不好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就用选票让你下台滚蛋，这才叫督促；你不好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我……我……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这不叫督促，叫乞讨！想靠乞讨去解决乞丐泛滥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的思想觉悟非常高，虽说我党一贯不差钱，但是“四万亿跟我有个蛋关系啊”，指望中国政府搞救助，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非民选的根本没有必要为人民服务。

我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福利院不要说是救济儿童，只要它们没有参与人口贩卖，那就已经算是善莫大焉了。那些没有后代的家庭宁愿花三五千元从人贩子手上非法收养一个子女再花钱打通关系上户口什么的，也不肯走合法途径去福利院替国家分担一点财政负担，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合法领养的成本远远高于非法领养。我这几天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原来在中国领养一个儿童还要交数万元的所谓“赞助费”，只要以“福利院+赞助费”为关键词搜索，立刻会找到一堆相关报导。本来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收费标准，领养费用不过寥寥数百元而已，根本就不存在赞助费这一项。这笔费用理论上应该是自愿捐助，实际情况却是“被自愿”，不给钱就休想领到小孩；本来符合收养资格的家长应该循先来后到的规矩领养小孩，实际情况却是价高者得，走“市场价格”，完全就是“合法”的人口贩卖，赤裸裸的权力腐败。

据南国早报的报导《领养孩子要交赞助费，有关部门称是领养惯例》，一对夫妇在试图收养时，福利院直接问他们能出得起多少钱，低于三万免谈，连个明码标价都没有。更可笑的是据南京晨报报导《老夫妇领养一年孤儿被带走，福利院索要高额费用》，南京一陈姓市民在收养一名儿童一年后，福利院突然出现将孩子强行带走，要求对方补交两万六的赞助费。此时该市民已和小孩养出感情，挣扎许久后终于痛下决心去满足福利院的勒索，结果对方却告知赞助费涨价到近四万元了，而且如果陈家再不出钱，这小孩就要被一户出得起钱的法国人给领走了。问这些福利院收费依据何在，答曰“国内惯例”——我国一贯有很多“惯例”，俗称“潜规则”，但你要是去投诉举报上告，那就纯属自己找蛋疼了。中国有一些小孩是被豆腐渣工程砸死的，有一些小孩是为了给领导让路被烧死的，还有一些小孩喝奶粉喝得连尿都尿不出来了，有关部门非但没有处理这些事情，反倒把带头挑事的家长送进大牢判了两年半。祖国这么混乱，你不过是被福利院敲了敲竹杠，领养不到小孩而已，就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好意思去叨扰有关部门吗？好意思吗？虽然也有陕西省安康福利院因为强索赞助费而遭惩处之类的报导（这笔钱当然是中饱私囊了，前几天我在淫淫网上说这些事，居然有人说收赞助费多好啊，可以减轻国家负担，这年头真是什么样的傻逼都有），但我相信媒体所揭露出来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很多地方的福利院虽然也被曝光，但照样是你说你的，



我收我的。正如我所说，中国政府那不能叫为人民服务，而叫给人民施舍，这就像你在街上碰到乞丐，给不给钱全凭个人喜好。

非法领养不过三五千元，合法领养却要数万，这中间的差价卖的是什么？是官印。所以说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将来千万不能做普通的黑社会，而要加入合法的黑社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啊。至于海外的收养中介开价更是惊人，不算几项“待定”费用就已经高达 16 万人民币了，面对如此之高的利润，福利院铤而走险、直接参与拐卖这种事根本不足为奇。2005 年湖南数家福利院就被曝出直接从人贩子手上购买儿童，入手价八百元，出手价三万以上，福利院甚至给职工摊派了工作指标，一年必须抱回三个孩子。谁说财政有负担啊，人家是巴不得货源越多越好，人贩子负责供货，福利院负责销赃，多好的产业链，中国这市场经济“自由”得恐怕连右派经济学家都要开始怀疑自己其实是左派了。09 年贵州又曝出福利院勾结计生办，对那些交不出超生罚款的家庭直接把婴儿强行抱走，伪造弃婴文件，再经福利院之手贩卖。至于安徽省砀山县福利院不仅从人贩子手上收购小孩，还兼职贩卖精神病妇女，端得是牛逼啊。当然，最好的做法是拓展国际业务，不仅收入高，而且小孩一出手，证据灰飞烟灭，你家长这辈子还指望能找得回来？

还是那句话，在这样一个国家，拐卖事业怎可能不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中国最大的人贩子是谁啊，我觉得咱就没有必要说得那么细了。问题是，这个人贩子你敢动吗？当然不敢，正义人士们只敢动动乞丐这种最弱势的社会群体。换了我自己同样不敢，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对那些打拐人士们的行为表示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不堪，其成果相比这个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而言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无奈的社会里，大概也唯有如此，才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得不是那么像一具行尸走肉了。

## 芦笛：一个大汉奸的忠诚观（社会）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74804.aspx>

原文日期：2011 年 02 月 01 日

我在《一条大河波浪脏》（错了，是《一条脏河波浪宽》，前者似乎更好，though）中提到某位青年在 YouTube 中发言谴责朗朗忘恩负义，网友 whopper\_junior 说：

“说来惭愧，那小青年有一句话最让我不能理解

他说是美国养育了朗朗，朗朗怎能忍心这样对待一个养育了他的国家。

也许是在中国呆久了，像‘国家’这么大的尺度的一个组织有恩于我的那种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了。

小时候觉得父母有恩于我，那是万分自然的事情。

后来工作了，觉得国营单位养育了我，恐怕也说得过去。90 年代那个时候国营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没有任何竞争，整天除了喝茶就是看报，深感自己没有给单位创造多少价值但是单位却照发工资，单位虽没有过什么但是养过我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后来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份清闲才决定下海经商的。

再后来就没有谁谁谁养育过我的感觉了。

也许常年在美国居住的华人感觉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朗朗常年在美国演奏，是给美

国政府上税，也让美国的演出公司挣了钱，并且台下看他演出的不少都是华人，想必有不少人是用人民币换的美元去买的演出票，所以朗朗跟美国人民之间究竟谁养活谁还说不准。

想想惭愧，这一代人，不但信仰的能力缺失了，连感恩的能力也没有了。不知该怎么教育下一代人。

很想知道常年住在海外的各位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在《罕见奇谈》上讨论过。那阵子有个山寨版日妇因为歌颂日本，被爱国贼们痛骂“有奶便是娘”，她于是说道，“有奶便是娘”是人间常情。小孩子就是谁带大的就跟谁亲。日本养活了她，当然日本就是她的娘，云云。这话博得了若干汉奸们的喝彩。

我看不下去，因出来说，大丈夫生天地间，从来就是自己养自己，没谁是让国家养的。这种错觉是我党蓄意制造出来的。他们把“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观念从小就灌注在咱们心灵深处，把党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寄生虫说成是全国人民的雇主恩公。这观念成了咱们埋在潜意识深处的永恒真理，所以马悲鸣才会写出篇腾笑千古的《一队夷齐下首阳》，嘲笑那些归国民运人士是下了首阳山去食共粟的奴才，而反共斗志最坚决的茉莉女士居然看不出那前提的荒谬，竟然声称自己一直以那垃圾文字作为座右铭，时时以之砥砺自己的气节，发誓绝不食共粟，要饿死在首阳山上。我于是写了《一队夷齐踞首阳》痛驳之，指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是谁养谁？不是人民食党粟，而是党食人民粟。流亡人士回国，不是叛国投敌，是行使他们的基本人权。连这基本观念都闹不明白，还配称什么民主斗士？

在反驳那山寨版日妇的文字中（记得题为《也谈“有奶便是娘”》），我引用了那篇驳马悲鸣与茉莉的文字，委婉地告诉她（那阵子还没与那日妇撕破脸，所以没有说得如现在一般明白），国家与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毫无可比性，八万杆子也打不着。只有无耻如共党才会强行冒充人民的母亲。只有白痴才会看不见母亲生我养我、而匪党强迫人民奉养的最本质的区别。莫非在国内做惯奴才，跑到自由世界来后，还要把政府当成喂养自己的老娘亲？这算是什么下贱德行？独立知识份子只忠于事实，无论走到哪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该以 *critical thinking* 去对待，避免让感情因素干扰自己的判断。这才是文明人的态度。过去我在国内对中共持此态度，出国后也对归化国持此态度。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什么就是什么，无论是对哪个国家都不隐恶，也不瞒善，绝不受主观情绪干扰。

话虽如此，能否充分发挥个人才干，实现自己的价值，仍然取决于国家，取决于政府，取决于社会，取决于制度。我对归化国充满了感激之心，因为我在这儿第一次享受了人的尊严，享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不是指物质）。而且，我认为，入籍宣誓是一种 *soul commitment*。我决定加入归化国的国籍，不是为了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的好处，而是因为做中国人从来不是我的自由选择，无 *soul commitment* 之说，犹如包办婚姻一般，我完全有权利解除。我选择归化国，是因为它让我首次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扬眉吐气地做了一回人，同时我也觉得自己能忠于入籍誓言，绝不会干出伤害本国利益的事来。只有不齿于人类的人渣，才会发假誓。而只有轻薄杨花逐水流者，才会为细故便轻易改换国籍。

这就是我为何痛恨那位写《妖魔化中国》的美籍教授（忘记那烂人的名字了）、宋鸿兵、郎咸平、岳东晓一干烂人。当然，那干烂人未必都是美国人。但这种烂人在美则为美奸，在华则为汉奸（真正的汉奸，不是卖国贼的辱骂），盖他们妖言惑众，蓄意制造中美摩擦，恶化两国民间感情，损害了两国的国家利益。

这也是我为何讨厌华裔爱美国（日本等等）贼，与讨厌华裔爱中国贼一般无二。在我看来，这两类人相反相成，相推相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目标就是恨不得中美明天就开战。

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心思。拿我这个叛国投敌的大汉奸来说吧，我忠于归化国，但我爱中国。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两国世代友好下去。如果两国打起仗来，我的心灵必然要被撕为两半——论道义责任与公民义务，我只能站在归化国一方。但在感情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视母国为敌国。因此，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平安，我也只能做促进两国友谊的桥梁，更别说这么做只会有利于两国的国家利益了。

这也是我为何鄙视那些“卖国求荣”辈。前段在网上看到某位日本的入籍华人大骂另外一位入籍的原中国艺术家。那位艺术家为对中国政府献媚，对媒体声称，她当初加入日本籍不过是因为旅行方便（如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是最没用的，无论上哪儿都要签证，连香港护照都不如，日本护照似乎可以走遍天下不必签证。耐人寻味的是，如今中国财力超过了日本，然而中国护照仍然是全球最不受欢迎的。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哪？国内网友说，咱们是在单行线上逆向开车，却指责所有的车辆都开错了方向。我看也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为何全世界联合起来歧视中国呢？过去还说人家是嫌贫爱富，如今又有谁比中国游客出手更阔？金钱买不来尊严，信矣哉）。那位新日本人于是破口大骂，说这种人为了旅行方便，便能放弃据说是她深爱的祖国，加入日本国籍。做出这种烂事来还不知耻，还要把它当成崇高的节操去到处宣扬。他可是加入了日本国籍就忠于日本，如果中日开战，他一定站在日本一边，云云。

那位新日本人的痛骂让我觉得十分解气，确实如此——人怎么可以只为了旅行方便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抛弃那据说是她无比热爱，至今还无限忠诚的祖国呢？既然可以轻易撕毁原来的 **commitment**，弃中国国籍如敝屣，那她所谓的对中国的刻骨铭心的爱与至死不渝的忠诚，还有什么价值？她入籍时庄严发出的誓言又岂不是放屁？为了区区细故，竟然能发假誓欺骗归化国政府，这又算是什么下三滥行为？比制造三鹿奶粉也不弱吧？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还当成是什么爱国壮举，却悟不出那只能暴露自己是双倍的“卖国求荣”——为了旅行方便就能轻易抛弃祖国投靠日本人，为了在国内受欢迎便说日本不过是她的利用对象，完全是双料犹太，还要吹到媒体上去。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恬不知耻的人哪？

就连那新日人宣称中日若开战，他一定站在日本一方，我觉得也能理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是应该的。但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么做，对许多新日人来说恐怕都是难以承受的心理灾难。因此，一个明智的新日人（或新美人，或新其他国家的人），最该做的事大概还是促进中日（或中美，中 X）亲善，尽一己之力化解两国民间的隔阂。不要如那山寨日妇或林思云那样，专门上网制造中日民间仇恨，把这当成是向新主子献上的投名状。

最后想再说一下“祖国”与“母亲”的概念。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乃至把“共产党”强行派给人民作母亲，似乎是我党的发明，在 1949 年前没谁这么干过。我已经反复解释过了，古代的“国”是帝国，不是民国。人民的效忠对象是皇帝，不是国家。古代中国人根本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因此没什么“祖国”之类的称谓，它似乎是外来语，也就是英文 **fatherland, motherland** 的翻译，原意是“父母之邦”，也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但或许是因为有 **mother** 这个前缀，便被共党（毛子开始的把戏？）篡改改为“母亲”。

但对我来说，“祖国”跟“母亲”的唯一联系，就是它是我的父母之邦，但不是我之邦。我爱它不过是长期生活经验使然，正如我爱吃中餐一样，与我对母亲的爱，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截然不同。我与生母的关系是不可解脱的，只要我一息尚存，这关系都存在，但自我脱离中国国籍那天起，我就再没有对它忠诚的义务了。

## 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其原因和后果（政治）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74294.aspx>

原文日期：2010年12月03日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圣经·约伯记》18章5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 序论、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共同命运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倡导和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开放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为所谓的对内改革也不过是学习和追赶西方的另一种开放而已，而且是以对外开放为前提的。没有对外的开放，就不会有对内的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这些成就虽然都是由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一个个中国人取得的，但这种国策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之前的三十年相比，这一国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2006年，笔者曾在《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一文中断言，邓小平的对内改革时代已经终结了，而2010年的国内外环境让笔者进一步断言，我们过去一代人所理解的对外开放时代似乎也已经进入了终局时分。改革与开放命运的相似之处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改革事业的肇始与开放事业的起步是由体制的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格局促成的；而改革事业的破产和开放事业的终结也是由现体制的特性和现有的政治格局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胡作非为之后，中共的极权体制面临着信誉破产的危机，为了挽救体制，体制本身有动力去发起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在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动力去促成这一事业，因为改革开放对它们是有利的，至少是利大于弊的。可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会与极权体制本身发生抵触，而且对于体制内的各种寄生性利益集团来说，改革开放的好处已经释放完毕，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威胁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正如改革事业被抛弃一样，现体制和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毫不犹豫地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走入日暮途穷的末路。

### 一、中国开放时代的终结标志着邓小平中兴时代的结束

邓小平所谓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在此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思想文化和制度观念难免会渗透进来。尽管邓小平知道门户开放后，难免会进来一些“苍蝇”，但他明白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他领导下的中共极权王朝事实上对西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并以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作为其对外开放政

策的基石。邓小平决心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关系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国策能够持续深入地推行下去的首要原因，这当然是由美国在全球秩序和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中美关系保罗万象，牵涉到方方面面，择其要者有三，它们分别是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本来，中美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美国的经济体制要求全球经济体系保持开放性，以利于对等互惠的自由贸易。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开放史表明，这种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也正是因为参与了这种经济体系才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在于维护和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和均势，以防止核不扩散并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对内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总体上看，美国所维系的全球和东亚安全格局是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美国所推崇的人权价值观对中国人也是好处多多，甚至是雪中送炭；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选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制度实践对中国走出极权统治的野蛮和蒙昧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证明，维系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但不幸的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近期在上述三个重要领域内的关系都在持续地恶化。首先是经济上的汇率问题，美方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称这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中共虽然在口头上多次承诺要改革汇率体制（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倒逼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非常有利于一般中国民众的），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国际社会指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其次是安全上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中共肆意要保护北韓的极端邪恶的金正日政权，采用各种极不负责任的手段包庇和纵容北韓的侵略行径，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和对立，让东北亚地区陷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之中。在人权问题上，中共指责美国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幕后操纵者，利用其所控制的喉舌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和西方价值观大加讨伐，在国内大肆限制人权活动人士的自由。显然，中共极权政府已经撕破脸皮，彻底暴露其凶残的本性，在人权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全面对抗。

如果将中美关系在这三个重要领域的争端加以总结概括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对抗态势。据笔者观察，在这种战略对抗态势出现之前，中共和美国有一段关系暧昧的时期。中共的国务委员戴秉国 2009 年 7 月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著名的中国核心利益说，由戴秉国所传达的中共核心利益的第一条就是维护基本制度，也就是保持中共极权统治的稳定。戴秉国提出这一赤裸裸的要求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中有人提出美国和中国应该互相确保对方的战略利益，比如布什政府任内的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现任的奥巴马政府中的副国务卿斯坦贝格（James Steinberg）则提出美国和中国要有互相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美国这前后两任副国务卿的政策建议都希望中国尊重美方的战略利益，也即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会照顾到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战略利益，也即创造空间和条件让中国和平地发展和强大起来。这一政策建议的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与中共对其自身（注意：不是中国）“战略利益”的追求是极不相容的，结果只能沦为一厢情愿。这两位副国务卿没有或者不愿面对的问题是，中共的战略利益非常不同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或者说中共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中共的极权体制不可能对国际体系负责任（正像它不可能对国内民众负责任一样），也不可能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还会有

更加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事态的出现是中共官方近年来所鼓吹和推动的各种反“对外开放国策”的论调的升华和果实。近十年来，中共一直企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出一条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具体来讲，中共的这种努力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在经济发展上，中共官方学者提出并大肆渲染“中国模式论，”不知各种原因，很多中外学者都甘做中国模式论的吹鼓手，试图颠覆已经演化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第二，在安全问题上，中共官方一直在鼓吹“中国崛起论，”这其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和深化，是要对现存全球安全秩序提出挑战和质疑；第三，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官方以“中国文化特殊论”作为挡箭牌，并在世界各地出巨资筹建孔子学院，企图以中共诠释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来“主动地”对抗普世的人权价值观。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王朝的对外开放国策似乎走到头了。当然，笔者所谓的开放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是说中国不会再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了。至此，邓小平留给中共极权王朝的两大遗产-改革和开放-都已经或即将寿终正寝。鉴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说，2010年将标志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共红色王朝中兴时代的正式终结。

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趋势，探索其原因和后果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释。

## 二、中共极权王朝的属性和逻辑让对外开放无法持续深入进行下去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战略对抗的态势？中共极权王朝为什么在中国尚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放弃对外开放的国策？仅仅以心态上的狂妄和自大来解释中共当局处心积虑的策略变化是不够的。笔者以为，中共的这种转向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原因：首先是由中共极权王朝控制下的中国的国家属性决定的，其次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格局使然，最后更与极权体制的运行逻辑有关。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家族”的中国，而非“民族”的中国。笔者并不否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竞争优势和结果。不过，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构建的，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民族国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首要难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中国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按照马科斯·韦伯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民族性或公共性，因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家族或者集团的私器。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是皇帝的私产，人民都是王侯的臣仆。职是之故，中国现在仍旧是名义上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家产制”国家，也即国家事实上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家族集团的，与一般大众所构成的民族无关。

简略地说，中国这个国家其实只是党产而已，而党产又进一步家族化了。毫无疑问，家产制国家的政治现实势必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因为实际上拥有或控制中国的家族集团肯定会把它们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家族和民族的分野和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中共极权王朝所内含的家产制政治结构阻碍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和平演变，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真正关心中国民族利益和热

爱中国的人士应当坚决发对的。也因此，笔者在这里必须强调，所谓的中美关系，形式上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但实质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普通大众在其中是完全被动的，在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只能是被中共所胁迫的人质。如果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中共对世界体系的排斥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其次，中共的极权体制逐渐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向。根据中国极权体制的代际权威递减规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干涉和制衡，中共的权力中枢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权力定律。由于其在体制内的巨大权威，邓小平所钦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其活着时自然无人敢于公开提出挑战。等到邓小平这个强人去世之后，中共外交政策的主心骨也就没了。中共的外交政策难免就开始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到如今，邓小平已经离世 13 年了，其影响力逐渐式微，他所提倡的对外韬光养晦政策自然就成了中共体制内某些力量集团检讨和修正的对像了。

据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王辑思透露，中共现在参与对美政策制订和咨询的机构竟然包括政法和宣传部门，也即政法委和中宣部成了对美决策的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正如中共各个利益集团的做大让中共无法有效地处理很多国内问题一样，它们也让中共的外交政策受到很多的掣肘。其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矛盾日渐激化，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愈益恶化一样，中共政权与国际社会的矛盾也越积越深，甚至到了无法在对美关系上保持合作姿态的地步。总之，中共极权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做大，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以至于邓小平本人的政策意志也无法继续贯彻下去了。邓小平作为这个分赃体制的始作俑者，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第三，极权体制内在的运行逻辑同样在支配着中共的外交活动。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共的极权体制本身与现有的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当对外开放还处于浅层次时，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冲突也不激烈。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体制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是，一旦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接触和融合开始向纵深发展，极权体制本身便会感受到各种的不适、不爽、不顺手、不自在，甚至是不安全，接着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排斥国际体系的趋势和倾向。这时，利益集团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利用极权体制本身的排他性来拒斥和反对国际体系了。其实，这根本就不奇怪，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伸。极权体制的本性是一定要反映在外交舞台上的。

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国际交流、竞争、合作是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规则和秩序带有明显的自由和法治的特征。中共所领导的极权政体则是独断专横的，它的这种本性注定了它会和国际体系发生冲突。中共极权王朝恰好在国际体系中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与国际主流社会唱反调：人权、发展和安全正好是联合国的三大基石，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三个领域的规则体系都和中共的极权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共作为暴力起家的执政集团，其特质既是霸道残忍的、也是自私无情的、更是没有平等之观念的。而国际体系的这三个领域所依赖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都与中共政权的原则和目标背道而驰。首先，国际人权体系所依赖的价值观是人的权利和尊严，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是自由开放下的互惠互利，而国际安全体系所追求的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秩序。这些都与中共极权王朝的习性和目标相悖。

更进一步说，中共极权王朝的运行依赖一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结构：冷酷无情的价值观基础、掠夺成性的中央集权官僚治理模式以及偏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读者朋友们或许能够

轻易地发现，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向的恰恰就是国际体系中的那三个重要领域：人权、发展和安全。笔者前几个月曾在《略论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一文中对中国极权统治结构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做过简要的论述。很不幸，这三个组成部分不仅让中国迟迟无法实现政治的文明化，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合作的阻力；前者早就已经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清王朝以来的中国专制政府在与现代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最大特点是不懂。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体现了论者的一定的洞察力，但仍不够透彻。笔者反倒以为，专制王朝在被动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时的最大特点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极权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不懂得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外交规则和礼仪，但他们一定懂得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利益。正是由于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完全接轨会危及极权体制的稳定以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从权力者的本能出发就反对按照现代世界的规则来进行交往。如此看来，不懂并不是极权体制的独裁者们的最大缺陷（不过倒真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好借口），因为如果他们不懂的话，西方人或者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慢慢也就学会了。不愿意按文明规则办事则是他们与现代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最终会动摇极权体制并危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是懂，也得装着不懂了。

### 三、开放时代的终结最终会让极权体制陷入危机之中

由于中美之间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重要领域里都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有人甚至断言世界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并把中美之间的较量视为“新冷战”的重头戏。中国的官方人士、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前不久则称：“中美关系破裂会出大乱子。”不管怎样，中共极权王朝在国际上所采取的新姿态、新做法和新战略会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上文说过，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是以开放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内在的极权结构让中国靠自身无法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到今天的状况说到底很大程度上还是外部力量渗透和推动的结果，所以，对外开放的终结可能比对内改革的破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更大。鉴于中国自 19 世纪以来的时局演变都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思考和预估对外开放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向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的终结将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乃至大倒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分享全球化红利的结果。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既获得了国际市场，更获得了为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更为重要的法治化的规则体系。比如说，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沿海出口产业-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成果，而最有规则意识的也恰恰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直保持健康的开放政策，逐渐学习并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并让自己的游戏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中共极权当局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拒绝继续适应国际竞争规则，鼓吹极端非人道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妄图颠覆自己曾从中受益良多的规则体系。

更有甚者，中共极权政府还以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为幌子，开始名目张胆地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唱对台戏，而且不顾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法治和人权领域大踏步地倒退。经济上的“中国模式论”和价值观上的“文化特殊论”为中共极权政府肆意扩张其权力，干涉公民自由和人权鸣锣开道。蛮不讲理和掠夺成性的极权体制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会变得更加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寄生于其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也会变得更加疯狂和



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必因此而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遭遇重大挫折。

其次，中共极权王朝将不得不面临国际上的重大压力和挑战。由于极权体制内缺乏向善的改良能力和意愿，其中的邪恶势力势将继续膨胀和扩散。恶势力的扩张不仅会在国内造成恶劣的后果，也必将严重地侵犯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官民矛盾会继续恶化一样，中共与国际社会（尤为显著的是美国）的关系看样子似乎也要恶化下去。国内民众在极权体制的压迫盘剥和严密控制下，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对抗能力和意志的。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大不一样，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时，它们必然会做出反应，而且其反制措施必然会对中国国内和中共造成很大的影响。

国际社会可能的应对主要是经济上的和安全上的，人权上的应对措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框架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比如，美国与韩国最近在黄海上军事演习对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日政权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难免会让中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经济上的应对措施可能会让国内的出口产业无法继续充分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中共王朝和中国过往王朝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已经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闭关锁国也不再符合极权体制中部分权势集团的利益。显然，中共是非常不愿失去国际市场的，一旦失去国际市场，国内的经济离崩溃也就不远了。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策略恐怕不是要压制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发展和崛起，而是要压制中共（注意：不是中国）的霸道蛮横和无法无天。否则，美方就不会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战略再保证”的对华战略了。

最后，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交恶必然会对极权体制自身的运行逻辑造成冲击。中国的极权统治秩序包含着一个互相配合和支持的三位一体结构：意识形态基础（专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内的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型官僚治理体系）与对外的霸道支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体制）。借用中国哲学的说法，这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形态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就像寒暑交替和四季循环一样，是一个自足有效的体系。一旦其中有一个环节被打破，这个极权体系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摧毁专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效力就不用说了，那乃是釜底抽薪之举；对内统治的破产会导致国内秩序的失控和危机；而对外治理的失败也会最终让体制在沉重压力下瓦解。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治理的失败可能会成为极权体制的一个软肋和突破口，因为这种失败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借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极权体制的这三根支柱就像是一个桌子的三条腿。当三条腿都健全时，桌子就是稳定的，当其中的一条腿折断时，桌子随时就可能倒下。对外治理的失败就相当于将其中的一条腿弄折了，极权体制将因此失去平衡。

### 结语：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之后，清王朝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不久之后更分崩离析了。清王朝的殷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共王朝与清王朝其实都遵循着同一套中国极权统治的逻辑和规律。不无巧合的是，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让中共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时期。不过，经过中共的三代领导人之后，这一政策现在事实上处于被废止的境地。这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局限所致，更是中共极权专制政体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邓小平对于执政党，也是“君王之泽，三世而斩。”人们不禁会问：中共极权王朝在经历了邓小平中兴之后会遭遇到与清王朝同样的命运么？

共产党领导下的极权政治结构是中国人学习遵守现代文明规则和文明价值的最大障碍。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动地进入现代世界的，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对外开放国策的废止就是让费正清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变得更加不确定，也即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不过，当极权体制在其自身逻辑的牵引下走向四面树敌、内外交困时，当它对内缺乏更新的能力和意愿（也即不再对内改革），并且对外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愿望（也即不再对外开放）时，它离崩溃瓦解也就不远了。

笔者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乃在于，当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而崩溃解体之后，中国人借着现代化的通讯传播手段和全球化的文化资讯交流将迅速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笔者坚信这一点，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也并不悲观。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0 年 12 月 3 日于北京